

聯合報叢書

中國文化的省察

牟宗三講演錄



聯合報
叢書

中國文化的省察——牟宗三講演錄

聯合報叢書

中國文化的省察

——牟宗三講演錄

講演者 牟 宗 三

發行人 王 必 成

出版者 聯 合 報 社

總經理 聯 經 出 版 事 業 公 司
新開局登記證局版臺報字〇〇三三號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五七號
郵政劃撥帳戶一〇〇五五九號
電話：七六〇一六六—三五二五

印刷者 永 裕 印 刷 廠

定價：新臺幣七〇元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十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一月第二次印行

印翻禁・權版有

編者的話

這是牟宗三先生的講演集。

近年來，牟先生應聯合報之請，數度返國講演、講學，所發表的講詞中，「從索忍尼辛批評美國講起」與「肯定自由、肯定民主」兩篇，已連同有關資料分別輯成單行本問世，今特將有關中國文化問題者數篇總為一集，以為關切中國文化前途的人士有所省察與體認。

牟先生的哲學已有其完整體系，這些講詞只是牟先生於著述之餘在不同時間應機而發的。雖記錄筆致不一，亦難免有重複之處，要在皆可表達他對中國文化的深刻看法。

本集中共收五篇講詞，「中國文化的斷續問題」指出中國文化目前在大陸上已淪為一種「材料」身分，面臨存亡絕續的關頭，只有靠著恢復其「形式」身分才能挽救。「文化建設的道路」（上、下）則藉著歷史的回顧，指出每一時代的文化轉向，並陳述今日的目標在於對學術教育做

1977.2.1/ok

批評性的檢討，在文化的層次上向大陸放光明。「漢宋知識分子之規格與現時代知識分子立身處世之道」說明從前知識分子因專制而遭遇悲劇命運，而近代知識分子則處於混亂分歧的意識衝擊中，致使馬克斯主義、共產黨造成亙古未有的大災害，因此現時代知識分子應以智慧來挽回國運。「中國文化大動脈中的現實關心問題」由政治、經濟的現實面著眼，陳述一般國民、政府官員、國家元首在國家架構中應有的適當地位及二千年來經濟問題癥結之解決方法。「中國文化大動脈中的終極關心問題」則探討文化的動源所在，說明為中國文化終極關心的是如何成德的問題。並指出政府在國民「富之」之後應該「教之」，以開啟民族文化中屬於精神、智慧、理想、光明的內容。

牟先生在前次六次講演中，以淺顯明白的語句，指出在今日的文化混亂局面中，我們應當如何以智慧與人格來傳承文化、開創新機。其明明不惑的真知卓見，值得我們再三深思。

目錄

中國文化的斷續問題·····	一
文化建設的道路(上)·····	一五
文化建設的道路(下)·····	三一
漢宋知識分子之規格與現時代知識分子立身處世之道·····	四九
中國文化大動脈中的現實關心問題·····	七一
中國文化大動脈中的終極關心問題·····	一〇一

中國文化的斷續問題

今天的講題是「中國文化的斷續問題」。本來如果一個民族仍然存在，那麼這個民族的文化總可以延續下去，無所謂斷不斷。但這其中也有一曲折。若一民族仍然存在，但它的文化卻不能盡其作爲原則並自己決定方向的責任，則此民族的文化就不能算延續下去。不能够作爲原則，不能够自定方向，則這文化就只是個材料，而不是形式。因此，一個文化若只有作爲材料的身分而不是形式，它就不能算延續下去；若要延續下去，這文化必須能決定自己的原則和方向。原則、方向即代表一個文化作爲形式的身分。大家知道形式與材料是亞理斯多德哲學中的名詞。材料是譯自 *matter*，一般翻爲物質，但在此處是「材料」的意思。與 *matter* 相對的是 *form*，簡單地說即是它自己本身是一原則、是一方向。凡是文化，必然涵着它自己的原則與方向，否則就不能算文化。如果一個文化只賸作爲材料的身分，而形式是外加的，這文化就算斷滅了。譬如做張桌

子，材料是木頭，形式可以是長方形、三角形、正方形，那是木匠加上去的。如果一個民族的文化只是材料，而形式是外加的，不是由這民族文化之根湧現出來的，這文化就算斷滅了。這是我們先從字面上來解釋「斷續」的意義。

最近對這個問題我已經講過兩次，為什麼會想到這個問題呢？前一陣在大陸上鄧小平出來發動「平反運動」，大家覺得氣氛似乎比文化大革命、四人幫時代略鬆一點，好像開了個通孔可以透透氣，如是有些青年就問：在這種略為放鬆的情形下，中國文化是否能夠漸漸地蘇醒、恢復呢？還不僅因為現在大陸上控制得似乎鬆一些以致令人有這種疑問，還有積極的一面，那就是大陸上現在要求「四個現代化」。既然要求現代化也就比較重視知識，不像過去在毛澤東、四人幫當權的時代，不但不重視知識，還非常輕視知識，用他們的詞語說是「要紅不要專」。「專」代表知識，即專家、專門的知識；而共產黨的目標是「紅」。紅是一種顏色，代表他們活動的方向和原則，因此說只要「紅」而不要「專」。毛澤東最瞧不起知識分子，稱知識分子為「臭老九」。為什麼叫「臭老九」呢？我當初聽到時有個想法，也許並不對。我當時想到在民國初年時，社會上有二種人令人討厭，也可說令人可怕，一種人是丘八（兵），另一種是青年學生，因此，青年學生便詼諧地被稱為「丘九」，這是民初時流行的辭語。後來有人說毛澤東口中的「臭老九」是根據元朝對人的分等而說的。蒙古人統治中國時將人分為十等，蒙古人是第一等，讀書人列於第九，還在倡優之下，所謂「七優八倡九儒十丐」。毛澤東根據這種異族統治中國的辦法來糟蹋知識分子，稱之為「臭老九」，真是可惡極了！還加上些「只要紅不要專」之類的新理

論。現在鄧小平當權，重視現代化也重視知識，連帶地對知識分子也比較客氣一點，也不再多講「紅」了。「紅」代表共產黨的理想性，所以一般人也想到大陸上的共產黨現在沒有理想性了，不再宣傳理想了。如此，一方面不再宣傳理想，二方面在現代化的要求下重視知識，三方面又出來平反，以平社會上的怨氣，在這三種情形下，不少人想到中國文化是否就可以復蘇一些了呢？是否可以趁此機會復興呢？有些人很樂觀，但我看並不如此，問題並不是這麼簡單。

現在大陸上雖然要求四個現代化、重視知識，但他們仍然不要「第五個現代化」。那麼他們所要求的實際上是科技——科學技術——的現代化。去年魏京生提出實行四個現代化的必要條件是要實行民主政治，否則四個現代化就不能實現。魏京生是大陸上極少數覺悟的人之一，他是共產黨幹部的子弟。在此我附帶提一下，將來在大陸上真正敢出來講話的就是這類年輕人，你不要期望那些老知識分子，他們根本就喪失了講話、用思的能力，早就麻木了。有希望的是共產黨幹部的子弟，他們有較痛切的感受，又有所恃，所以敢講話。那些被毛澤東貶為「臭老九」的老知識分子早就被壓死了，他們不但是不敢講話，根本就不能講話了。最近不是放出一些人到美國去嗎？像費孝通、曹禺等，這些人在抗戰時期是最進步的分子，結果還是臭老九，到了美國仍然不敢講話，費孝通甚至自稱是「費不通」。我所謂的老知識分子就是指這類當初替共產黨作啦啦隊、所謂左傾的人，這些人已經沒有希望了，有希望的是魏京生這類共產黨內部的青年。但魏京生一公開要求第五個現代化，就立刻被逮捕，並且判刑十五年。鄧小平也知道判得太重，但不能不判，就冤枉一點算了。由此可見共產黨絕不容許第五個現代化。四個現代化都屬於科技的範圍，科技

——所謂「專」——是中性的、沒有顏色的，蘇聯不也高度科技化、現代化，可以和美國分庭抗禮了嗎？那麼中共不也可以科技化、現代化嗎？不要以為他們能够現代化就可以開明一點，可以打開個通孔讓人喘喘氣。那根本是假的，是作不到的。通孔、喘氣都在第五個現代化上。由此就可以知道所謂恢復中國文化並不容易。

有人說中國文化是人性的文化。任一個民族的文化都是本諸人性人情、自然而然地長期演進而成的，並不是某人設想一套理論或主義而訂定的，也不是某個社團寫下幾條教條（dogma）就可以決定的。教條不能構成文化系統，例如某個帶有宗教性質的秘密社團規定每一分子都必須讀幾何學，並且不能吃豆子，這是他們的教條，是沒有道理可講的，也沒有普遍性，當然也不能成一個文化系統。任何文化系統都是那個民族順着人性、人情之常而自然演變出來的，中國文化尤在表現這個特徵。中國文化不是個宗教性的文化，而是本於人性人情之普遍性而自然演化成的。因此大家由這裏講又很樂觀，認為中國文化既是本諸人性之常，那麼不管遇到如何的政治鬭爭，廣大的羣眾總是一樣的。天天在生活、交往中表現的人性人情是最普遍的，所以大家認為只要有「人心」的地方就有中國文化。籠統地這樣講也不錯，平常以此為一基本信念也是對的，這講法最能表現中國文化的普遍性、廣大性、悠久性。凡人心人性所在即有中國文化，不論毛澤東如何摧殘都不能毀掉，它總會復蘇的。這講法可以作為最初的基本信念，人人都當該有此肯定。

但只這樣講還不够，大家都相信「凡人心所在就有中國文化」，但這只是第一步。平常大家不是都愛說「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嗎？所謂「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

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

還不必說到聖人，只是普通人也可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但是這幾句話大家講慣了，都不注意：這句話究竟在具體生活中表現到什麼程度。假定真是如此，不就沒有衝突、歧見了嗎？因此又有一句話說「人心不同，如其面焉」。這和前一句話正好相衝突牴觸。這兩種相反的成語在中國社會中一樣地流行，以至於習而不察。如果讓一個外國人聽見，馬上會覺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這句話有問題，而「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倒是不錯。這就立刻顯示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是個理想，用康德的哲學名詞來表示，這是一個「超越的原則」transcendental principle，因此就現實而言是有問題的。於是說「中國文化是本諸人性人情」、「凡人心所在即有中國文化」，就需要仔細的考慮與釐定，不能隨便說過就算了。否則你說「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但毛澤東的想法就和你不同；毛澤東是根據馬克斯的想法，你說「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其心同也，其理同也」。正好德國出了個「聖人」馬克斯，就此心不同此理不同，那怎麼辦呢？因此剛才說對中國文化當然應該有這樣的信念，但只是如此仍是不够的。

我們再仔細看看這本諸人性人情的中國文化，在大陸上天天如何表現於具體的生活之中。三十年來大陸上農民的生活並沒有多大的改變，人人當然都被編在人民公社裏，但在家庭中，父子兄弟、夫婦妯娌之間、人與人的交往還是和從前一樣，那麼中國文化在這裏究竟是什麼樣的身分呢？我們馬上可以想到中國文化只成了材料。你知不知道本諸人性、人情、由人心深處發出來的

中國文化在大陸上只有材料的身分？中國文化在大陸人民具體的生活裏，就好像「水銀瀉地，無孔不入」，到處流行，這是中國文化的遍在性，本諸人性、人情就具備了普遍性。但現在在大陸上中國文化就只是個材料，可以加上任何的形式。那麼形式在那裏呢？形式是馬克斯主義啊！這是外來的，不是由中國文化中發出來的。

形式是個框框，是個圈套。把框框加到材料上去，材料就隨着形式而轉。材料是被動而不是主動的，是被決定的而不是能決定的；主動而能決定的是馬克斯主義。不僅在毛澤東時代是「只紅而不專」，現在鄧小平還是要「又紅又專」，「紅」並未被放棄，像魏京生的講法才是要放棄「紅」。魏京生要求的第五個現代化也代表一個形式，這形式和共產黨的「紅」相衝突，如果真實行第五個現代化，那就表示共產黨要放棄馬克斯主義了。你看大陸上放棄了沒有？一點也沒動啊！陳雲有次說：「我們現在面臨一個重要關頭，究竟我們還要不要社會主義？究竟這社會主義能不能貫徹？它究竟行是不行呢？」要大家作個決定。你要知道這是陳雲一時氣憤的話，他並不是真要大家平心靜氣地考慮馬克斯主義究竟適不適合於中國，究竟是否有真實的道理。如果真是大家要考慮的話，那才是可商量的。陳雲是對下面的幹部說：大家不好好地幹，那社會主義要不要呢？這種氣憤之話是不能當真的，高級幹部隨時可以這樣說。在這種情形下，他們不會放棄馬克斯主義的。

馬克斯主義代表一種形式，這是外來的，所謂「馬恩列史」，馬克斯是德國猶太人，恩格斯是德國人，列寧是俄羅斯的猶太人，史達林是俄羅斯人，四個都是洋鬼子，中國人在那裏呢？中

國四千多年的文化，從黃帝起，歷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直到現在，難道沒有一個中國人嗎？這還講什麼中國文化？中國文化只成了材料嗎？用亞里斯多德的名詞來說，這時的中國文化只是純粹的潛伏性 pure potentiality，而形式是外加的。這時中國文化喪失了自己的原則性，自己決定方向的特性，不能作為生活的原則；生活的原則是馬克斯、共產主義所決定的，那麼中國文化在那裏呢？這就是文化的斷滅。因此文化若要延續下去，就要念茲在茲地保存自己的原則性、決定方向性，不能隨便地放棄。所以每一個國家平常都要爭主權，不能隨便被亡掉，這是文化斷滅問題的關鍵。爭主權就是爭原則性、方向性，縱使一羣妄人有主權，而自己的文化變成材料，為外來的形式所決定，那文化也斷滅了，那主權也是假的，那是所謂「自亡」，「自亡」是大惡。所以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能隨便放棄自己生活的原則、自己決定方向的權利，一放棄國家就亡了，文化就斷滅了。

現在有好多莫名其妙的人被共產黨宣傳的「回歸祖國」「認同祖國」所迷惑，這些口號毫無意義，而海外的知識分子卻毫不考慮。你的祖國、你的文化在那裏呢？因此常令人懷疑這些知識分子究竟有沒有知識。說沒知識，他又有好多所謂科技的專門知識；說有知識，這麼簡單的事他竟也看不出來；這是現代知識分子可悲的地方。由此諸位可以想到毛澤東看不起知識分子，貶之為臭老九也是可理解的。毛澤東固然不對，但知識分子本身是有那種卑賤性。其實專家和知識分子是不同的，專家是 specialist，知識份子 intellectual，二者並不相同，專家不一定有知識分子的知識。不要一聽到「認同祖國」就噏噏噏地都回去了；不要一看到鄧小平出來平反，要求四

個現代化，就高興地以為有吃飯的地方了。共產黨最喜歡知識分子的這種卑賤性，因為他所要求於你的只是工具性，你也只是個工具、材料。他並不要求你「紅」，那方面你也無權過問。你不是有專門的科技知識嗎？共產黨最歡迎這種人，你一回，他的統戰就成功了。他給你很高的待遇，你只要幫他造原子彈就行了；到不需要你時再一腳踢開。奇怪的是現在的知識分子就吃這一套！在這種情形之下還講什麼中國文化？

我們說在大陸上中國文化現在是以材料的身分保存著，那麼該如何恢復它作為形式的身分呢？第一步我們先要了解中國文化的基本性格，否則它隨時都可陷落為材料。中國文化本諸人性、人情，由人心深處自然發出來，這乃是籠統的說法，確定的意思不易很簡單地說明，說得太抽象了也不容易了解，好在大家多少都知道一些。這個由人性、人情、人心深處發出來的，四千多年來極具根源性創造性的文化系統，它的特點在那裏呢？特點在於「重視理性」。「理性的健康性」是中華民族文化的一個主要特點。中國文化能否維持形式的身分而不只是材料，就看中國人以何種方式來表現理性。

照大陸上的情形來看，黃帝子孫變到出現共產黨的時候是最沒有理性、最不可理喻的，他們毀滅中國文化也是「理所當然」的事了。共產黨最沒有理性，最不可理喻，但諸位也要仔細想，共產黨員雖都有不平正的反動性，但並非是神經病啊！在某方面他們的頭腦冷靜、虛偽做作，狡猾得很，這不就是理性嗎？諸位或許會這樣說。但這並不是理性，這至多只能說是「理智」。理智指一個人精於算計，不容易受騙，所以理智和情感衝動常是相對而顯的。理智並不是我們所謂

的理性，即不是中國文化常常表現的「理性的健康性」的理性。

卡西勒講國家的神話，提到希特勒的集權專制，一方面是要國家的神話，宣傳耳曼民族的優越，一方面是利用高度的科學技術。將國家的神話和高度的科學技術這二個相反的成分相結合，就成為當年希特勒的集權獨裁。國家的神話使得人人如醉如癡，你以為他們瘋了，其實不然，他們使用的策略、手段都高度的科技化。卡西勒已看出這種現代的集權專制比以往大皇帝的專制可怕多了。希特勒要的是國家的神話，毛澤東要的是人民的神話。大陸上科技落後，但無論發展到什麼程度的科技，都可以被共產黨利用。除了科學的技術，就是政治鬭爭的技術——狡滑、奸詐也都需要冷靜的頭腦，情感一衝動就沒有這些了，這也是高度的技術。這種高度的技術和人民的神話相結合，就成為共產黨的集權專制，這和希特勒的集權是二種不同的形態。你不要看他不是瘋子，冷靜、奸滑得很，能够利用一切，就以爲他有理性，這其實並不是理性。假定你勉強地仍要說理性，也是成了材料的理性。理性成了材料，就可以被利用來作極端非理性的事，極端殘暴、不可理喻的事，這是廿世紀中出現的古怪的情形。

理性也可以被利用爲材料，共產黨就很明顯地利用理性來作極端非理性的事。這話矛盾嗎？並不。「運用理性」之「理性」其實是「理智」，是科技所代表的；「極端非理性的事」的「理性」才是我們所說的理性。如果都說理性，前者就是科技的理性。科技的理性沒有顏色，人人都可以運用，孔子可以用，強盜也可以用，所謂「盜亦有道」。雖也有道，但終究仍是強盜，不是聖人，此中的分別是在聖人有理性而強盜沒有。所以「盜亦有道」的「道」所代表的就是科

技的理性、理智。在此可以借用康德的兩個名詞來表示，被利用作為材料的理性就是知解的理性 *theoretical reason*，淺近地說，就是科技的理性；聖人的理性、我們所謂的理性是實踐的理性 *practical reason*，淺近地說，就是道德的理性。共產黨可以利用高度的科技理性作出極端不道德的事，就在這層意義上說他們沒有理性、不可理喻。理性的這兩層意義常被攪和在一起，只要頭腦清楚一些就可以解開，不為它所迷惑。

這個時代這種古怪的情形最多，運用理性可以作出極端非理性的事來，運用自由一樣也可以達到自由的否定。當初共產黨出來爭自由，到他得到自由了，我們就都沒有自由了，這不是成了自由的自我否定 (*self-negation*) 嗎？他當初也要求民主，到他爭取到了民主，我們就不能在民主中生活了，這也成了民主的否定。自由、民主、理性都可以當作材料來利用，唯一不變的是作為形式的馬克斯主義。聖人所講的道理一樣也可以被當作材料，他也可以講忠孝仁愛等等。例如要愛同志，但對階級敵人不能仁愛；父母可愛不如毛澤東可愛；為忠於黨忠於社會主義可以大義滅親、鬭爭父母。這不也是利用仁愛作極端不仁不愛的事，利用忠孝作極端不忠不孝的事嗎？你說他有理性，他的理性在那裏呢？這不是很可怕的現象嗎？這需要大家仔細地想一想。現在我們處的是個非常麻煩的時代。

我們借「運用理性來作極端非理性的事」這句話來表示共產黨沒有理性，而中國文化是講理性的。中國文化發自人性、人情、人心深處，不是某個教條、某個理論或某人的觀念系統所決定的。這個文化系統幾千年來以理性——也就是所謂「理性的健康性」——為其最高原則，以此決

定生活方式，決定個人的、國家的活動之方向原則。儘管歷史上有曲曲折折的升降，這基本的方向大體是不變的。這是什麼樣的理性呢？照中國的傳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傳下來的文化，用最簡單的話講，理性就是社會上每一件事，發自人心的每一活動都自歸其位，各當其位。用現代的話來講，發自人心的有道德、宗教、政治、國家、家庭等，每個概念都有其一定的分際，例如家庭不要和社會混淆，家庭歸家庭，社會是社會。家庭中有父子兄弟夫婦等，孔子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個概念各當其位，各有其自性，保持住各自的獨特性再講相互間的關係。保持住各自的獨特性並不是要各自孤立，生活是不能孤立的；由自性再講關係，分際毫不錯亂。這是自覺地要肯定每個部門，每個概念都有自己的特性，各歸其自己，不互相凌駕。所以家庭是家庭，社會是社會。從國家講政治，政治中的概念和家庭的概念不同，和社會的概念也不一樣。法律是法律，經濟有經濟的基本原則，都是一定的。還有信仰，宗教信仰也是自然地發自人的生活，聖人也不反對信仰。你可以信仰佛教，信仰基督教，或是其他的宗教，但不管你信仰那種宗教，總要肯定普遍的人道。所以講道德時，道德歸道德；講宗教時，宗教歸宗教；講科技、科學知識時，也要知識歸知識；每一面都有一個恰當的地位。就怕攪和在一起，一混淆就難以維持理性的清明。中華民族的聖賢歷代都自覺地有這種各部門各歸其自己的要求，他們有一凌虛的理性，使得各部門各得其所，這凌虛的理性不能對象化，也不能特殊化。家庭、社會、國家等都各有客觀的地位，各有特殊的意義，理性卻在此之上，使各部門各得其恰當的地位，各得其所。再擴大來說，理性就是中庸所謂的「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這表示不單在人間社會中家